

瘫痪11年,期待能够站起来

绝望时曾瞒着家人捐献遗体,圆梦行动让男孩重拾信心

13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原本活蹦乱跳的王福军硬生生“按”到病床上。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身只有两根手指有活动能力的他,11年来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继母的精心理和无私的关爱,成为24岁的王福军唯一活下去的动力。得知本报万期圆梦征集梦想后,王福军鼓起勇气向本报求助。10月14日,本报进行了报道,得知王福军的情况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积极组织专家会诊、济宁圣华驾校派出专车提供交通便利,一场爱心的传递帮助王福军圆了深埋心底11年的梦。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康宇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专门针对王福军病情进行仔细研究。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11年瘫痪在床 男孩写来求助信

10月初,本报发起了“万期圆梦行动”。13日上午收到了一位名叫“彩虹男”的网友发来的求助信。“我叫王福军,2004年秋天刚度过13岁生日,上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24岁的王福军坦言,11年来,自己是一天天数着日子度过的,“今天是第4006天,我几乎都要绝望了。”

王福军出生在曲阜市息陬镇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的童年幸福而快乐。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10月17日,一场灾难毫无征兆地袭来。“那时正坐在初中一年级的教室上英语课,突然感觉左手小拇指一阵麻木。”预感到身体不适的王福军跑出校园大门不到100米,竟然失去知觉,“全身好像触电般麻木,一碰就钻心地疼。”王福军被邻居和闻讯赶来的父母送到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后,被确诊为颈椎脊髓血管瘤。多年来,家人四处求医,带着年幼的他几乎跑遍省城的各大医院,寻遍各种偏方,但康复的进程却在“胸部以下无知觉,只有右手两根手指有活动能力”中停滞。

“我不想每天活着只是可以呼吸,才24岁的我,青春和身体已经被病魔囚禁得太久太久了。每天只能呆在家

里十几平方的空间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相比身体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更加难以承受。我不想这样在家度过一辈子,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梦想,也不愿意只能依靠父母照顾,更不想以后父母不在了拖累社会。”这段平实的文字,道出的是王福军深埋在心底11年的痛楚和无奈。

“求求你们,帮帮我。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来信中,王福军希望能找到一家权威医院,确定一下自己有没有康复的可能。“如果能够康复是最好的结果,即使没有康复的希望,悬在心头的石头也算落地了。”

悄悄捐献遗体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14日上午,当记者走进曲阜高铁站旁的一处农家小院时,见到的是一个爱说爱笑的阳光大男孩。坐在轮椅上的王福军热情地与记者聊天,电脑音响中飘出的是《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清爽歌曲。“尽管生活艰辛,但大多数时间我还是一样的开朗。”王福军笑着说,即使十个手指只有两个能动,但他依然能敲击桌面跟随音乐的节拍。

“在我3岁时,母亲意外去世了,8岁那年,妈妈来到我们家。”王福军口中的妈妈,是他的继母毛长华。儿子生病后,相对满面愁容的丈夫,毛长华始终态度坚定:不管多苦多难,一定要为孩子治病。治病需要钱,毛长华坚持让丈夫王贵民到外地打工,自己则独自挑起带儿子四处治病的双重担。

2014年开始,王福军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全身80%的部位没有痛觉、触觉,双手双脚已经肌肉萎缩变形。他瞒着家人,偷偷在网上报名向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当工作人员带着协议书来到家中时,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毛长华坚决不同意。“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能把你照顾好,为啥考虑那些事?”在王福军的记忆中,这是母亲第一次掉眼泪。那次,王福军第一次没有听妈妈的话,在《遗体捐

献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爱心力量涌来 助坚强男孩圆梦

15日,本报报道继母毛长华11年如一日照顾儿子的事迹后,众多社会爱心力量纷纷涌来,很多读者致电询问王福军的近况,并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表示,愿组织最强的专家队伍为王福军会诊,济宁圣华驾校也表示将主动安排专车,为王福军的治疗提供便利。

16日下午2点,济宁圣华驾校的爱心专车准时来到王福军家,王福军和毛长华早早地等在了大门口。“得病这么多年了,自己在网上也跟很多病友讨论过,但是大家说法太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王福军难掩兴奋之情,“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救,能不能站起来。”下午3点30分,王福军抵达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候在门诊大厅的护士用轮椅将他推到了病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闫中瑞、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赵长地、脊柱外科主任医师邢宝华对他进行了会诊。

由于下肢瘫痪,王福军双脚呈现不健康的黑紫色,小腿皮肤也因供血不足出现局部坏死。一点点触碰下肢,闫中瑞医生仔细查看反应,同时询问王福军的感受。“因患病瘫痪时间太长,想要重新站起来的可能性极小,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康复治疗。”闫中瑞着重提出,通过康复治疗,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腿部肌肉萎缩。由于相隔11年,很多过去拍的X光片,病历都无从寻找,“我们只能了解大致病情,如果能找到以前治疗的病历,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病情。”

通过专家的诊断意见,王福军坦言,自己对病情有了更清晰、全面的了解,“即使恢复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我还是打算在医院做康复训练。”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如王福军有信心,他们也将提供最大的治疗便利。

▼济宁圣华驾校工作人员将王福军从家中送到医院。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一位老读者的梦想:在报纸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父亲曾保护过抗日工作者家属

在来信中,他回顾了自己和晚报结下的情谊,他说自己曾“向齐鲁晚报投过十余篇稿件,比较遗憾的是一直没被刊用,只要持之以恒,写作水平一定会有提高,总有一天贵报会刊登我的文章”。

之前因为版面有限等原因,我们一直没刊登于先生的稿件,而这次,他回忆父亲的文章让人动容,我们刊登出来,与读者一起分享他的故事。

文/于深基

父亲于承恺,1903年生于青岛市原崂山县于家下河村。他从小读私塾,所以能写会算,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到春节来临,他便应乡亲们的请求写出一副副好春联,那流畅清秀的行书让人赞不绝口。

父亲一生最大的亮点,最值得我们兄妹骄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保护过那些抗日工作者的家属们使他们没有遭到任何损失。父亲十八岁时便背起铺盖步行四十余里从家乡到青岛市考进了邮电局,由于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能干,所以深受领导信任和同事们的拥护,不久便升任支局长。

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攻占了青岛,其魔爪也伸进了邮电局。由于父亲人缘好,口碑好,所以取得了那些地下工作者的信任,父亲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不久他们接到上级的命令便奔赴前线。为了保护家属们的安全,父亲便告知东西南北四条邮路的邮递员们每天收发信件时,一定把这些人家属的信件提前分拣出来,交给父亲,然后由他秘密封存好,等躲过宪兵特务的检查后再由专人送出。天长日久,特务们没有查到任何蛛丝马迹,便对父亲产生了怀疑。

一天上午一位负责检查信件的宪兵队长以“通共”的罪名把父亲叫到了宪兵队,审问父亲的是土谷能登队长。

这土谷能登臭名远扬,很是狠毒,所以父亲想这顿严刑拷打是难以避免了,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所幸的是在审问开始前,突然土谷能登接了个电话,然后对队长耳语了几句,便离开了审讯室。这时队长满脸堆笑地问父亲:“桐山诚是你什么人?”父亲说:“他是日本派来的市局副局长。”队长说:“你是位支局长,精通业务,今后应该带头做好有助于中日亲善的工作,你先回去吧。”从宪兵队出来后,父亲听说是沧口工商联合会和几位有希望的人士出面将父亲保释出来的。

父亲总算是化险为夷,有惊无险。母亲却在家里吓得打了软腿,整天提心吊胆。解放后谈到父亲遭遇时还心有余悸。